

关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张亲霞

(西安外国语大学 社会科学部,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为探索关学在儒学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运用文献、史实与逻辑分析方法,就关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认为,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理论在儒家教化的发展中对于推动儒学教化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士人走向寻常百姓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关学对儒家教化的推动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关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规民约——《吕氏乡约》;关学特别重视在宗族乡里实行礼教;关学人物在讲学中特别关注民风民俗的改善。

关键词:关学;教化;乡规民约;礼教

中图分类号:B2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2-0106-04

用道德教化百姓是儒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教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教化在儒家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基于此,有的学者甚至称儒家的哲学为教化的哲学^[1]。

先秦儒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主张行德治、施仁政、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如孔子主张富而教之,主张只有通过道德教化,民才能“免而无耻”。但是他们在旧的礼乐秩序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年代,主要是通过周游列国的说讲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教化思想,尤其是希望在上统治者能够采纳自己的主张,自上而下地实行对百姓的教化。战国时期,儒家虽然有了“显学”的地位,但是它还是没有脱离民间群众团体的性质。这一时期儒家教化主要表现为以学校教化为基础的教化,教化主要通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儒家早期代表人物的讲学活动的形式展开。

秦汉以后,儒家逐步和官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制度化的儒家。汉代设立经学博士,经学被列于学官。唐代刊发《五经正义》,代表了当时制度化儒家的经典形式。宋明新儒家面对佛、道的挑战,一方

面从本体上寻找对于经典“义理”的诠释,这时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儒家进一步通过官方学校教育的途径强化社会教化;另一方面,宋元明以后,儒家的乡村社会教化活动得以加强,基层社会教化普遍展开,从民间层次上和佛、道相抗衡。当时基层社学教育乡人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书院关注乡俗教化;家族规法、乡约面向族人,妇女儿童教化活动进一步加强。总之,秦汉以后,作为和官僚政权相结合的儒家,儒家的教化通过官方制度化的种种途径加强了对社会的影响和渗透,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儒家的社会教化逐步由官方、上层社会向民间社会渗透。

无论是先秦民间性的儒家还是秦汉以后制度化的儒家,教化都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的教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官方教化到民间教化的发展历程。儒家逻辑上看主要包含有三个层面:心性化儒家,制度化儒家和世俗化儒家。心性化儒学强调个体的心性修养,制度化的儒家把儒家的理念通过政治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世俗化的儒家则要把儒家的理念和百姓日用密切结合起来,渗透到

收稿日期:2007-11-19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07JK106)

作者简介:张亲霞(1966-),女,河南灵宝人,副教授,博士后。

百姓日用中去。宋代以前的儒家主要是心性化儒学和制度化儒学,宋元明清时期儒家突出地体现为世俗化的特征。

关学是以宋代张载为首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张载去世之后,他创立的关学本身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明朝后期著名学者冯从吾广泛搜集,汇集关学学者的学行,著《关学编》,将宋金元明时期及其孔门四弟子47人列入其中。后来《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称之为关学,冯从吾之后,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对冯从吾的《关学编》加以续订,搜集了明清之际的著名儒学学者,冯从吾本人亦在其中。总之,关学从宋代张载开始经过金元明的发展,到清朝早期才告终结。关学在儒家教化发展过程中对于推动儒家教化由官家、学院走向民间,由士人、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一、创立乡约制度

关学使儒学教化发展走向民间化,突出地表现为关学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规民约。蓝田三吕——吕大钧、吕大忠、吕大防,曾经师从关学创始人张载,是张载之辅。吕氏兄弟在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实践礼学,完全按照礼俗进行,后来他们在乡里推行冠婚饮酒、相见庆吊之礼。他们用乡约使民风敦厚,泽被乡里。宋史记载吕大钧撰《吕氏乡约》。吕氏兄弟推行乡约是对张载时期形成的改善风俗行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关学创始人张载做县令的时候,“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会于县庭,亲劝酬之,使人知养老师长之义”^[2],通过召父老高年者进行慰劳的形式起到使人“知养老师长之义”、“孝弟之道”的作用。吕大钧和张载是同年的进士,吕大钧佩服张载的学问,而张载佩服吕大钧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张载认为“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和叔就是吕大钧。吕大钧在乡里推行古礼,而古礼的基本精神就是教化。如《礼记》云:“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3]。

吕氏兄弟的《吕氏乡约》使张载改善风俗的行为进一步制度化。《吕氏乡约》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的约规主要有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体现了浓厚的民间自治特点:乡人自愿加入;由乡人推选管理者,“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以聚会的形式,使乡人相亲,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赏罚公开,“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用记录在案督促众人,

用开除以惩罚不可救药的人;议事民主,“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在乡约制度下,乡人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照应;乡人定期聚会,有礼让的仪式,有融洽的气氛。通过乡约,培养了乡人彼此的亲近、友爱、融洽的关系。通过乡约,发挥了乡人的爱心,为少数疲、癯、残、疾、恂、独、鰥、寡者提供了社会保障。杨开道先生云:“《吕氏乡约》的基本主张,在树立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礼俗的标准,使个人行为有所遵守,不至溢出标准范围以外。这种步骤在礼学里面,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4]。

北宋灭亡以后,朱熹把《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改编写,这就是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由于朱熹是闻名全国的大儒,《吕氏乡约》才得以闻名天下。明代儒学教化走向民间,乡约成为明代儒学的习惯。明代的方孝孺提出了一套堪与《吕氏乡约》媲美的乡族制度。方孝孺主张以礼仪正风俗,认为用礼仪教化百姓比用刑罚管束百姓效果更好。方孝孺的宗法乡族之制深得后世学者的赞赏,萧公权先生云:“方孝孺远袭周礼,近承宋代乡约,其法兼采互助自治之原则,以解决人民教养之问题”^[5]。王阳明在为官期间认为,“民风不善”,是由于“教化不明”,因而颁布《南赣乡约》,以改善民俗。明代还有许多官员及儒士在为官或乡居期间推行乡约,如吕坤的《乡甲约》、李春芳的《订乡约事宜》、唐灏儒的《葬亲社约》、刘宗周的《保民训要》等。这些都充分说明,有明一代儒家的教化已经很普遍地在民间推行。儒家的理念也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从乡约在儒家教化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其开端是由关学的代表人物而起,由此可以看出关学在儒家教化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二、重视躬行礼教

关学使儒家的教化真正民间化,和关学在日常生活中贯彻礼教的种种做法也有很大的关系。礼教为本是关学的基本致思趋向。当代学者陈俊民先生认为,“欲复三代”的超唐史观是宋代道学诸派的共同群体意识,张载“以礼为教”便是关学“欲复三代”的独特的致思趋向,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的区别在于洛学是以礼为敬,关学是以礼为教,前者注重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后者则注重变化气质,修己成德,二则礼渐成俗,风化社会,最终达到经世治国,“及乎后世”之目的^[6]。“知礼成性,变化气质”是张载的教育宗旨,由此看出礼教在张载思想中的地位

和作用,张载把礼教看作教育的首要任务。

张载的礼教在当时名重一时,他著有《横渠张氏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可惜这些书现今都已经散佚。张载传世的《正蒙》、《经学理窟》中仍有许多关于礼学的内容。张载的礼学尤其注重礼的社会教化功能。他对乡村生活中的家族生活中的常用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尤为重视,并着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加以推行。司马光将张载在家族乡里推行古礼的行为概括为:“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7]。由于张载竭力倡导和推行古礼,“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继承宋代关学重视礼教的传统,明代三原关学学者王承裕“教人以礼为先。凡弟子家冠婚丧祭,必令率礼而行”。泾阳人吕潜“尤严于礼,诸冠婚、丧祭式必如古人”。蓝田学者王之士“诸洒扫、应对,冠婚、丧祭久废,每率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由于王之士努力,“蓝田美俗复兴”^[2]。

为了推动儒学礼教民间化,关学还采取了多种形式推波助澜,如发布檄文就是关学进行社会教化的一种基本形式。张载时“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阎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虽僻壤妇人孺子毕与闻,俗用翕然”^[2]。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张载害怕檄文不能达于民,所以要谆谆告诫乡长,使僻壤妇人、孺子皆能闻听教化。

关学的上述做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明代的儒学,明代的儒学有浓厚的民间化特征。明代儒学的民间化有多种原因。明代对文化士人采取笼络和严酷控制的手段。随着封建皇权专制的恶化,儒者为了寻求自保,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封建科举制度录用人数的沿袭不变等原因,致使许多儒者失去“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经世致用”的途径,如弃儒就贾、民间讲学,这样儒者与平民社会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儒学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融合,封建社会儒学由精英文化逐渐向平民文化道路转变。当然,明代儒学的平民化、世俗化也和宋代关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明代的三原学派学者特别注重礼教。如王恕云:“五福在人,若无礼乐法度,则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放僻邪侈,自陷于罪,岂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极,有礼乐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于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则是人君收敛敷布以兴之也”^[8]。也就是说,王恕认为,“礼乐法度”是保持社会有序性的前提,也是人安享五福的前提条件。在三原学派

的学者看来,遵守礼乐法度才是真正关注人的存在的体现。据冯从吾《关学编》记载,三原诸子在实际行动中恪守礼教,关中地区也因了他们的教化,崇尚礼义的风气很浓。三原学派的学者如王承裕,躬行礼教,以身作则感化乡里。冯从吾的《关学编》记载,“(王承裕)笃孝,能悦亲养志,……又善事诸兄……与人交,温乎可亲而又凛然不可狎”,王承裕还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等书教化乡里,美化了三原的士风民俗。他们不仅个人在为人交友、行事的过程中注重礼仪,而且注重用礼仪风化乡里,变革民风民俗。又如明代的著名儒者薛敬之,他在现实中是孝道的楷模,他的母亲喜欢吃韭菜,母亲死后,他终身不忍再吃韭菜,其思母之情由此可见。再如吕楠,其师去世,他“衰经哭拜”。吕楠立教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官至三品,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

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都是宋代关学把儒家教化进一步平民化、世俗化的推进。因为明代的这些学者本身就是关学遗脉在明代的延续。这一点有明代大儒冯从吾先生的《关学编》为证。

三、改善民风民俗

宋元明清时期关学代表人物的讲学活动对推动儒家教化的民间化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明代的关学代表人物冯从吾的讲学活动为例,本文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是晚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关学在明代的重要代表人物。由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是明代四大书院之一,天启年间还与人在北京创办首善书院,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讲学是冯从吾一生中很重要的内容,冯从吾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把讲学活动与端正士风民俗有机地联系起来。冯从吾曾为秦地士风之日下而慨叹、焦虑。在讲学中他针对秦人风俗提出批评:“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于无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押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于无忌惮……”^[9]。对于秦人不能成人之美之俗,冯从吾深有感触,他说:“世间最有功德事,莫大于成人之美。南人每见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称赞之,羽翼之务底于成。秦俗则争讥笑之诋毁之务,底于败,如此则师复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损”^[9]。秦人之间相互诋毁,结果双方只能造成两败俱伤。冯从吾孜孜讲

学,希望通过讲学变革秦人风俗。

冯从吾讲学,变革民风民俗首先从士人做起。冯从吾认为,世风厚薄和士人关系密切,而且作为士人应该在整个社会发挥表率作用,引导社会向善。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冯从吾与诸君子立会讲学于长安宝庆寺,制订了后来在关中影响深远的《学会约》,对士人学问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学会约》中特别提出了树立“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的尚实学风。

不仅如此,冯从吾讲学尤其重视躬行践履,对学者总是“以躬行相劝勉”,并发出“呜呼!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耳”的号召^[10]。冯从吾讲学尤其注重的尚实,这点不仅表现在他的有关言论上,而且体现在他的行为中。冯从吾面对明神宗的浸废朝讲,多次上书以谏,神宗震怒,廷杖责罚。关学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和学风在冯从吾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冯从吾讲学中的躬行践履,把讲学和端正士风民俗密切结合,所有这些对推动儒家教化由官方走向民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 语

先秦儒家的教化观念主要是通过说教的形式传

播,秦汉以后儒家的教化主要通过政权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儒家的教化发展过程中,关学对于儒家教化的发展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这突出表现在:关学的乡约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关学对礼教不遗余力的在民间进行传播推广;关学代表人物在讲学活动中对端正士风民俗的重视等方面。关学是儒家教化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关学对于推动儒学教化的民间化、世俗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家哲学的一种新诠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2] 冯从吾.关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济南: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
- [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6] 陈俊民.学政不二,礼教为本:从张载关学独特的致思路向看关学研究的新面向[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2,19(3):27-31.
- [7] 司马光.张载集·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8] 王 恕.石渠意见:卷一[O].李锡龄辑刻本.
- [9]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二[O].康熙癸丑年重刻本.
- [10]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六[O].康熙癸丑年重刻本.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roles of the Confucianism in Guanzhong

ZHANG Qin-x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the role of Guanzhong Confucianism, the paper, with the help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analyzes main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s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vein combs of Guanzhong Confucianism.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Zhang Zai, as the first ancestor's Guanzhong Confucianism theory, enlightens in the Confucianist the development from official to the folk regarding the impetus Confucianism enlightenment, and also from the common people to the gentleman.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uanzhong Confucianism manifests prominently that it established the first village rule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on social practice and folk custom in the lecture.

Key words: Guanzhong Confucianism; enlightenment; village rule; Confucianism